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

ZHONGGUO
TIANZHUJIAO
DE GUOQU
HE XIANZAI

顾裕禄 著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B979.2

74060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

DH82/04

顾裕禄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

顾裕禄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诸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9,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ISBN7-80515-326-4/B·17

定价 2.00元

是非善恶从头说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代序

罗竹风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从原始的萨满教到世界三大宗教，几乎什么都有。汉民族人数最多，而信仰宗教的人却最少；在50多个少数民族中信仰宗教的几乎占多数，有的宗教甚至同民族密切揉合，渗入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成为民族凝聚、联系的纽带，例如伊斯兰教就具有这种特点。

比较完整的宗教形态，只有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所谓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从外国传来的。基督教又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也称耶稣教），多与西方殖民背景有关，因此很长时间被人们称为“洋教”，在信仰、教义、礼仪、生活方式等方面是同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格格不入的，因而相互矛盾和隔阂也特别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相当于临时宪法）里就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历次《宪法》也都沿习不变而且更加完备。由于中国不信教的人口占多数，更由于宗教处于唯物主义思潮的汪洋大海中，再加执行宗教政策屡有失误，主要是来自“左”的思想、路线的干扰，单从某些人的主观愿望出发，企图用行政手段促使宗教迅速消亡，这在广大人民特别是信教群众中往往造成不良影响，

以为宗教总是要被消灭的。其反拨作用必然产生一种受压抑的心理，有的甚至惶惶不可终日！几十年来的经验反复证明：这样作不仅是无效的，反而会刺激教徒的宗教感情，产生离心作用，变成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唯一正确的作法，只能是认真、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正当的宗教活动予以保护，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最大力量。对宗教信仰者，只能要求他们“爱国爱教”：在现世爱祖国，同时也爱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并使教会不断纯洁，不再受外国势力和野心分子所利用。

宗教徒能够“爱国爱教”，就证明宗教政策已经发挥了它的威力；反之，也说明工作不到家，应当认真反思。是真正的教徒，他必然爱教并受宗教信仰规范和宗教道德所制约；但作为宗教信徒，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又不能不履行全体人民的共同职责，这就是爱国守法。事实证明，爱国爱教是并不矛盾的，处理得好，可如鸟飞鱼游，悠然自得。如果硬要说只准爱教不准爱国，那是死胡同一条。除了自找烦恼之外，又有什么好处呢！

不信教的人在中国既然占多数，就有一个多了解点宗教的问题存在。如果毫无所知，信与不信者之间必然会产生隔膜；多了解一些，就会缩短差距，在共同的事业方面携手并进。你了解宗教么？应当多涉猎有关书籍，获得一些初步知识。对于天主教来说，顾裕禄同志写的这本《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便可起这种“登堂入室”的作用。

中国天主教是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传入的，主要在明万历年间。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主权完整的独立国家，可以自由行使权力。常言说得好：“入国问俗，入乡问禁”，利玛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作到了3条（即所谓“利玛窦规矩”）：

1. 尊重中国固有的礼教，准许教徒祭祖拜孔；2. 结交上层儒士、官员，由上到下，争取打开局面；3. 以当时的先进科学成果为皇朝服务，如舆地、历法等等。这样做，果然取得了成效，使天主教在中国站住脚，并逐渐传播。

后来发生了所谓“礼仪之争”，以法国传教势力为首的传教士改弦更张，破坏了“利玛窦规矩”，强制中国教徒不能祭祖拜孔，并得到当时几个教皇的支持，最终发出了“禁约”，因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清康熙晚年和雍正朝即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活动，并驱逐出境。在天主教看来，这是遭受了极大挫折，然而却正是“咎由自取”。

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门户，侵略所及，使中国受到的都是屈辱和压迫。清王朝在失败之后，同各帝国主义签订了许多投降卖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其中又多把“传教权”作为内容之一。从此以后，伴随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帝国主义势力日益扩展和渗透，而天主教也变成它们手中的侵略工具了。一直到解放前夕，天主教的教权完全为外国传教士所操纵，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处于无权状态，只好俯首贴耳地受他们摆布。如果有敢于谈论和参加反帝爱国的教徒，便要受到“绝罚”，而“绝罚”对于信徒来说，正如一个人被宣布死刑一样可怕！这大约可以说是中国天主教的第二阶段吧。至为平常的道理可以充分说明：国势凌弱，宗教也必然处于“附庸”状态，而不可能挺起胸脯来自立自主。难道这是中国天主教徒们和神职人员甘愿忍受的屈辱么？

1949年全国解放，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蒋家王朝彻底崩溃了，帝国主义也被陆续赶走了。但是天主教的反动势力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立即挑起了

不再供给辅仁大学任何经费的事端，以为这样就可以迫使中国人民和天主教徒屈服。经过一场较量，我国政府收回了辅仁大学的教育权，归自己办理，并且由天主教知名学者陈垣担任校长。

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天主教爱国的教徒与梵蒂冈所控制的外国传教士经过无数次的较量，终于割断了与梵蒂冈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并取得了自选自圣主教和办教的主权，而成为中国天主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

以上算是中国天主教的第三阶段。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和变化，决不是天主教徒们都能了解底细的，更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顾裕禄同志的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大家看过以后，不禁会发出感叹：“原来如此！”

这是一本以史实为基础的通俗读物，从明清一直叙述到现在，主题极为明确：中国天主教究竟走过了一条什么曲折的道路，而解放之后“善”与“恶”的斗争又是多么错综复杂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虽然是一本通俗读物，却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比较严密的科学论证。它从实际出发，全面而又客观地叙述了历史的真相和演变，令人心悦诚服。

明末爱国科学家、最早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徐光启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不管对于天主教徒也好，宗教研究工作也好，推而广之以至研究哲学、历史学的人们也好，如果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可以保证一定是“开卷有益”的。

前 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对宗教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也活跃起来了。从近几年见之于书刊的有些研究宗教问题的文章中，笔者感到有一个卓见颇值得重视，就是在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上，主张“从实际出发，联系中国的现状，研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宗教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是新课题，在以往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有从实际出发，对我国宗教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确切可靠的材料，在事实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才能取得较正确的认识。

笔者曾较多接触天主教实际。解放前，中国天主教的基本状况是：它完全受着外国势力的支配。解放后，天主教爱国人士和广大教徒开展爱国运动，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终于把外国势力支配的中国天主教改变成为我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中国天主教的这个巨大变化，是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50年代前期，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国情和我国宗教的历史、现状，制订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力支持并帮助天主教人士和广大教徒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调动了天主教界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不幸在十年动乱中，我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也受到冲击，损失很大！最近

几年，党和政府拨乱反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界团结努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一正义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天主教不是我国固有的宗教。它什么时候和怎么会传入我国的，又是怎么发展的？外国势力是怎样支配它的，中国教徒怎样处于无权和受压迫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反帝斗争中天主教徒的表现怎样？解放后爱国的天主教徒怎样取得了摆脱外国势力控制的胜利，又怎样独立自主自办着教会，以及当前他们又怎样在为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等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问题，将使我们看到：中国天主教状况发生根本变化，是得来不易的；天主教徒能为祖国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也是值得庆幸的。我们应该用新眼光来对待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我国教徒以及他们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

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笔者不揣简陋，试写了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供诸同好。引玉之砖，尚祈赐教为感！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罗竹风、陈一鸣、阮仁泽、浦作、余青、傅克勇、王宏逵、张志群、肖志恬、刘建、龚方震、瞿明明、袁蕴常同志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汤履道、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陆薇读、顾梅青，上海天主教神父范良佐、汤孝昌的关怀、鼓励和帮助。特别是罗竹风、陈一鸣两位老同志和王宏逵同志对二、三稿的修改给予宝贵的指导。在资料搜集方面，管理上海天主教图书室的顾依英修女给予不少方便。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目 录

前 言.....	1
----------	---

一、天主教的传入.....	1
---------------	---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1) 景教不是天主教(2)
元朝方济各会士来到中国(3) 明末罗明坚、利玛窦进入
中国内地(4) 利玛窦留居北京(7) 徐光启信天主教
的过程和特点(9) 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11)
李之藻和杨廷筠信天主教的特点(12) 明末天主教徒的宗
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状况(14)

二、发展的第一阶段.....	25
----------------	----

崇祯帝起用汤若望(26) 汤若望向宫廷传教(26) 南明传
教士的小插曲(27) 顺治帝与汤若望(29) 汤若望案及其
剖析(31) 各地传教士遣送广州(32) 康熙恢复使用有专
长的传教士(32) 康熙帝与南怀仁等(33) 中国主教罗文
藻和中国神父吴渔山(35) 反对“利玛窦的规矩”的传教
士(37) 教皇派使者来中国(39) 康熙对传教士政策的改
变(40) 雍正下令禁止传习天主教(40) 处理外国教会、
外国传教士和我国关系的历史经验(42) 雍乾嘉道四朝传
教士和天主教徒状况(43)

三、发展的第二阶段.....	51
----------------	----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上海(51) 传教士在《北京条约》
中文约本中私加进“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53)
孟托班与北京南堂的重开(54) 教案的最根本起因(55)

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的发展(57) 中国神父、修女及其传教方法(57) 教会学校中的传教活动(60) 天主教孤儿院、施诊所等和发展教徒的关系(61) “打官司教”、“娘子教”和“传代教”(63)

四、外国势力的控制.....66

主教在教会中的地位(66) 外国人充当中国主教的历史(67) 一百多个外国主教(69) 中国教徒处于无权和受压迫的地位(72)

五、爱国思想和爱国表现.....78

爱国思想较薄弱的原因(78) 传教士对教徒爱国活动的压制(79) 英敏之和马相伯(81)

六、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天主教.....88

天主教内出现严重反共现象的原因(88)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梵蒂冈的对华政策(89) 梵蒋正式建交(90) 史贝尔曼插手支配中国天主教会(91) 葛礼耕和华理柱(92) 于斌协助蒋介石打反人民内战(94) “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罪恶活动(96) 外逃和“撤退”(97) 散布共产党“灭教”等谣言(99)

七、解放初的基本状况和变化..... 106

解放初中国天主教内复杂状况举例(106) 政府对天主教工作的开展(114) 反帝爱国运动的掀起(116) 黎培里等对教徒爱国运动的破坏(119) 驱逐黎培里(120) 决定性的胜利(122)

八、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建立..... 135

走爱新中国的道路(135) 倡议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37)

周总理和天主教人士的第二次谈话(138) 皮漱石总主教的
鲜明爱国立场(139) 发起人会议(140) 毛主席说：“可以
团结起来了！”(141)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正式成立(141)

九、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145

对梵蒂冈历史真相的认识(145) 成都主教区实现自选主
教(147) 汉口武昌两主教区自选主教实现自圣(149) 痛斥
庇护十二1958年的反动“通谕”(151) 走在独立自主自办
教会的道路上(152)

十、深刻的教训..... 156

十一、我国天主教界正沿着50年代开创的道路

继续前进..... 162

党和政府对天主教工作的恢复(162) 跟上80年代新形势
(167)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教务委员会的成立(168) 反对
梵蒂冈对邓以明的非法任命(169) 开办神哲学院(171) 出
版经书和刊物(171) 习仲勋副委员长的讲话(172) 为两
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174)

结束语..... 179

后 记..... 185

一、天主教的传入

天主教在什么时候传入我国？是唐朝，元朝？还是明末？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认为须先弄清楚基督教（拉丁文 Christianismus）和天主教（拉丁文 Ecclesia catholica）的关系，弄清楚天主教和传入我国的基督教另外几个教派的区别。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天主教是基督教几个大教派中的一个教派。基督教是公元1世纪产生的脱胎于犹太教的一个宗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历史渊源关系，在经典方面有所因袭，如基督教的《圣经》中的《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然而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宗教。

基督教产生后曾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迫害。这状况至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开始发生根本变化。4世纪末，基督教已不但从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受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宗教变成了主要是统治者利用的宗教，而且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经过几个世纪特别是成为国教后的发展，基督教的分布范围已达欧洲西部、北非西部、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北非东部。欧洲西部和北非西部的教会，经典、教父著作、礼仪等，使用拉丁文；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和北非东部的教会则主要使用希腊文。罗马帝国设立东西两都和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酿成的东西教会的分化日益加深。1054年两教会正式分裂。分裂后，原西教会自称“公教”，

即天主教；东教会自称“正教”（拉丁文Orthodoxa），即东正教。

5世纪时基督教内出现了一个被自称“正统派”斥为“异端”并加以迫害的聂斯脱利派（拉丁文 Nestorianus）。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又从天主教内产生了与罗马教皇相抗衡的“抗罗宗”（英文Protestants），即“新教”。新教也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在外文中，基督教和基督教各个教派各有专名，但在我国，由于新教俗称耶稣教，又称基督教，基督教一词遂产生了两种涵义：一、指世界性公认的基督教各派总称，二、指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弄清楚在我国基督教一词有上述两种涵义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就难说清楚它们各自的历史。

历史上基督教不止分成上述四个教派，还有别的教派，但传入我国的是这四个教派。四个教派中，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人们通常称之为基督教三大教派，聂斯脱利派则是一个较小的教派。这些教派在教义、教仪等方面有同有异，但在教会组织关系上都各自为政，门户之见很深，且又各以基督教正统自居。^①

景教不是天主教

上述基督教四个教派中最早传入我国的是聂斯脱利派，即我国历史上所称的“景教”。1625年（明天启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②本世纪初又从敦煌石室中发现景教中文经手抄本，证实景教在唐贞观年间由叙利亚人阿罗本等传入我国。后因武宗下诏灭佛，“祆教景教遂亦联带波及”^③，传入我国的基督教这一派一时在中原灭迹。

天主教内曾有人把景教说成就是天主教，从而把天主教传入我国的历史追溯到唐朝，^④这是张冠李戴。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天主教是基督教的又一个教派，景教不是天主教。

元朝方济各会士来到中国

天主教内有一种称作“修会”的组织，参加者是天主教徒中矢志守贞的男女出家人。最初的“隐修院修会”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隐修院内。13世纪产生的“托钵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则到外面活动，有的会士并出外传教。

元朝方济各会士来到中国。因此，说天主教在元朝传入，亦无不可，但必须指出，元朝在汉人中没有天主教徒。

13世纪上半叶蒙古西侵所到之地，如中亚多聂斯脱利派教徒，俄罗斯、东欧有基督教各教派的教徒。他们中有些人被虏或随使节来到了当时蒙古的都城和林。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作使者到和林，企图向大可汗贵由传布天主教，徒劳而返。贵由在给柏朗嘉宾带回的复教皇书中说：“尔来书云：朕宜领洗信从基督。朕可告尔，朕不知为何而应领洗。”^⑤柏朗嘉宾以后来到和林企图传布天主教的使者，也同样失望西归。

元朝建立后，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奉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于1294年来到北京。从他1305年写给欧洲同会修士的第一信中可以看到：他初到北京时，聂斯脱利派教徒在皇帝前说他是“奸细”、“巫人”、“骗子”，“如此诽谤五年之久”，最后由于聂斯脱利派教徒中有人“忏悔”，皇帝才知道他“清白无罪”，是受“诬陷”，于是将诬陷者“逐放”。之后，他在北京“建一教堂”。在1306年的第二信中，孟德高维诺说，1305年他在大汗宫门前“又建一新教堂”，“可容二百人”，两教堂“均在城内”，他“每星期轮流至一教堂主持祭奠”。^⑥孟德高维诺发展的教徒中有汪古部（在今河套五原县包头镇诸地）高唐王阔里吉思，原是

聂斯脱利派教徒，改信天主教后“率大部分臣民皈依天主教”^⑦，但他去世后，这些人又成为聂斯脱利派教徒。除此以外，孟德高维诺在第一信中说：“据估计，在此经我施洗者约六千人”，在第二信中说：“自我来契丹国鞑靼地，^⑧已为数千人施洗”，^⑨两个数字不完全一致。可见关于孟德高维诺发展教徒的确切数字，当难认定。

1307年，教皇格来孟五世任命孟德高维诺为北京总主教，并派方济各会的七个主教来中国。这七个主教中只有三人到达北京。他们给孟德高维诺行了“祝圣”礼。这三个主教后来都相继到了泉州，并都在那里去世。孟德高维诺于1328年卒于北京。

在我国历史书上，聂斯脱利派也好，天主教也好，元时都被称为“也里可温”。据我国史学家陈垣考证，当时“也里可温皆色目人”，“现尚未发现”汉人“为也里可温者”，^⑩就是说，元朝在汉人中既无聂斯脱利派教徒，也无天主教徒。

元亡，也里可温绝迹于汉人地区。

明末罗明坚、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

明末传教士来到中国，和元朝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15~16世纪，传教士到海外，是奉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派遣。葡、西是欧洲第一批殖民主义国家，又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天主教会势力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向海外开拓有着双重推动力：既是进行殖民扩张，又是为发展西方天主教会势力。它们派遣传教士，也是为了达到这双重目的。因此，不管传教士的主观动机怎样，客观上都有着这个背景。

1510年葡萄牙占领果阿后，企图在东亚追求政治、经济利

益的胃口越来越大。它以果阿为根据地，略取马六甲，并继续东向。与此同时，它伙同教会派遣传教士到印度。当时西方天主教会内派遣传教士最得力的是耶稣会。耶稣会是1534年由西班牙军人出身的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创立的一个新修会，其目的是企图在宗教改革运动后重振天主教势力。1541年，罗马教皇保禄三世和依纳爵·罗耀拉应葡王若望三世的请求，派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到东亚传教。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首批会士之一。他从里斯本乘葡船到印度，后又到日本。1552年来中国。他到了上川岛，无法进入广州，不久病死在这个小岛上。

葡萄牙占领澳门后，从里斯本启程的耶稣会士中有的也到那里，并建立了住院。来到澳门的耶稣会士分三种：第一种，留在澳门；第二种，准备去日本；第三种，准备进入中国内地。

澳门是一个很小的半岛，它有一条狭窄的土腰和陆地相联。澳门葡商获得在限期内进入广州贸易的机会后，中国南大门实际上已有所开放。1578年，耶稣会“印度和日本教务巡回使”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i）去日本时，在澳门耶稣会住院差不多住了一年。他研究中国的情况，研究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新方法，最后作出了准备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要“中国化”，要“学习中国语言文字”^①的决定。有的教会史书把这个新决定称为“范礼安计划”^②。为实施这个计划，他写信给果阿的耶稣会印度省省会长，请他派一个能胜任这一使命的耶稣会士到澳门，后者选中了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1579年7月，罗抵达澳门。

罗是意大利人。到了澳门后，他向已去了日本的范礼安函请“派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做他的同伴”。^③范礼安同意